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世界投资报告2017

投资与数字经济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詹晓宁 主编

冼国明 葛顺奇 总校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世界投资报告2017

投资与数字经济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詹晓宁 主编

冼国明 葛顺奇 总校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投资报告. 2017 : 投资与数字经济 / 詹晓宁主
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310-05462-6

I. ①世… II. ①詹… III. ①对外投资—调查报告—
世界—2017 IV. ①F8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686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立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85×210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477 千字

定价:15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说 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与企业司是集中处理联合国体系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相关事务的部门。在投资政策分析和企业发展领域有着逾 40 年的研究经验和国际专业知识，并建立了政府间协调机制，为超过 150 个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本出版物版权归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所有。在注明参考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和本报告后可自由引用或转载。引用或转载本报告内容的出版物需提交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秘书处（电子邮件：diaeinfo@unctad.org）。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7.II.D.3

ISBN 978-92-1-112911-3

eISBN 978-92-1-060703-2

Copyright © United Nations,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at United Nations, Geneva

序 言

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全球流量下降了约2%，降至1.75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流量降幅更大，达到14%，并且流入最不发达国家和结构脆弱经济体的投资流量仍不稳定且较低。尽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预测2017—2018年间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将温和复苏，但该流量仍远低于2007年峰值。

上述发展情况令人担忧，尤其当考虑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巨大投资需求，详细情况已在UNCTAD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投资行动计划中说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以及长久和平需要更多的投资进入基础设施、能源、水和卫生设施、气候变化缓解、健康和教育以及生产能力建设领域，以促进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确保全球政策环境仍然有利于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UNCTAD在提供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体制指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UNCTAD的投资政策框架和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路线图已被130多个国家用于制定新一代投资政策。201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建立在此基础上，并就如何处理近3000份旧一代投资条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化发展是当今全球经济中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主题章节表明，数字经济正对全球投资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该章节为数字经济对虚拟时代投资政策制定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见解，并就投资政策如何支持数字化发展提出建议。

借此机会，我赞赏作为国际投资和发展共同体重要工具的这本报告。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联合国秘书长

前言

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它为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机遇。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严峻的政策挑战——其中首先需要弥合数字鸿沟。机遇和挑战均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政策考虑。

数字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跨境生产和销售商品与服务的方式。数字跨国公司可以与海外的客户沟通并向其销售，而不需要在国外市场进行大量实物投资。因此，它们在生产能力建设和创造就业方面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更难以捉摸且更不直接。当今，数字经济不再仅仅是技术部门和数字企业，越来越多的是全球经济各个行业供应链的数字化。

国际生产的数字化转型对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以及投资者行为的规则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实体经济的规则可能需要根据新的数字商业模式重新审视。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向现代化的政策迈进；其他国家则面临着规则过时或无意中减缓数字经济发展的风险。

数字经济并不仅仅关乎数字跨国公司，还有关于国内数字能力的发展。因此，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然而，大多数战略未能妥善处理投资问题。另外，这些战略倾向于专注电信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数字发展战略的投资政策应该放宽，以使国内企业能够享受数字化带来的利益，并且能够更便利地进入全球市场。

《世界投资报告 2017》为数字经济的综合投资政策框架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报告表明，使投资政策与数字发展战略协调一致将对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以及未来几年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化发展发挥关键作用。这对于探讨如何缩小数字鸿沟和应对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面临的巨大投资挑战而言，是不可磨灭的贡献。借此机会，我将这本世界投资报告作为重要的工具推荐给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政策共同体。

穆希·萨·基图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秘书长

致 谢

《世界投资报告 2017》由 James X. Zhan（詹晓宁）领导的工作组编写。工作组成员包括 Richard Bolwijn、Kwangouck Byun、Bruno Casella、Hamed El Kady、Kumi Endo、Thomas van Giffen、Michael Hanni、Kálmán Kalotay、Joachim Karl、Hee Jae Kim、Ventzislav Kotetzov、Isya Kresnadi、Guoyong Liang、Hafiz Mirza、Shin Ohinata、Diana Rosert、Astrit Sulstarova、Claudia Trentini、Elisabeth Tuerk、Joerg Weber 和 Kee Hwee Wee。

研究支持和投入由 Baumgartner、Lorenzo Formenti、Mark Huber、Malvika Monga 和 Linli Yu 提供。同时得到了 Dafina Atanasova、Charalampos Giannakopoulos、Natalia Guerra、Mathabo Le Roux、Anthony Miller、Abraham Negash、Moritz Obst、Sergey Ripinsky、Jacqueline Salguero Huaman、Ilan Straus 以及实习生 Mohamed Mrad Namji 和 Armando Pascale 的支持。

数据统计支持由 Bradley Boicourt、Mohamed Chiraz Baly 和 Lizanne Martinez 提供。

Caroline Lambert 和 Lise Lingo 担任编辑；Pablo Cortizo 负责报告图片、表格、信息图的设计；他和 Laurence Duchemin 共同担任报告的内容排版。《世界投资报告 2017》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 Elisabeth Anodeau-Mareschal、Anne Bouchet、Nathalie Eulaerts、Rosalina Goyena、Peter Navarette、Sivanla Sikounnavong 以及 Katia Vieu 的支持。

《世界投资报告 2017》得益于 Michael Kende 的建议。在报告准备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本报告起草初期的专家研讨会阶段，工作组得益于外部专家的评论和建议，他们是 Azar Aliyev、Robert Atkinson、Nathalie Bernasconi、Philippa Biggs、Lisa Borgatti、Jansen Calamita、Patrice Chazerand、Silvia Constain、Christopher Foster、Torbjörn Fredriksson、Xiaolan Fu、Ambika Khurana、Markus Krajewski、Simon Lacey、James Lockett、Fernando Loureiro、Erik van der Marel、Makane Moïse Mbengue、Teresa Moreira、Jan Mischke、Ghislain Nkeramugaba、Davide Rigo、Cristián Rodríguez Chiffelle、Stephan Schill、Jagjit Singh Srai、Leonard Stiegeler、Alykhan Vira 和 Eric White。

同时，感谢来自 UNCTAD 其他部门同事的意见，作为内部同行评议过程的一部分，以及来自秘书长办公室的意见，作为审查和清除过程的一部分。联合国制图部门在地区地图方面提供了建议。

众多中央银行、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对《世界投资报告 2017》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UNCTAD 还感谢所有 MNE 和投资促进机构（IPA）负责其 2017 世界投资前景和投资促进机构调查的高管们的支持。衷心感谢瑞典政府提供的财务资助。

缩 略 词

ACP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AU	非洲联盟
BEPS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IT	双边投资协定
BRICS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CETA	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
CFIA	合作和投资便利化协定
CFIUS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TA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议
CIDS	国际争端解决中心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
CMO	合同生产组织
COMESA	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CSR	企业社会责任
EAC	东非共同体
ECT	能源宪章条约
EPA	经济伙伴协定
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
ETEA	经济、贸易扩张协定
FET	公平和公正待遇
FfD	以发展目标筹资
FIE	外商投资企业
FTA	自由贸易协定
GVC	全球价值链
IIA	国际投资协定

ICSID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Ts	信息和通信技术
IPA	投资促进机构
IPFSD	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
ISDS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
ISP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T	信息技术
ITU	国际电信联盟
IXP	互联网交换点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LDC	内陆型发展中国家
M&As	企业并购
Mercosur	南方共同体市场
MFN	最惠国待遇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ICI	国家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卢旺达）
NT	国民待遇
ODA	政府开发援助
PAIC	泛非洲投资法案
PPP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TIA	区域贸易和投资协议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SEZ	经济特区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ME	中小企业
SSE	可持续的证券交易所
TFTA	三方自由贸易区
TIFA	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
TIP	包括投资协定的条款
TISA	服务贸易协议
TNI	跨国经营指数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TIP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
UNASUR	南美洲国家联盟
UNCITRAL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VCLT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内容提要

全球投资趋势

全球投资正温和复苏，预计 2017 年将有谨慎乐观的发展。主要地区经济增长加快的预期、贸易增长复苏和企业利润回升都可能推动 FDI 的小幅增长。全球 FDI 流量预期将于 2017 年增至约 1.8 万亿美元，并于 2018 年继续增至 1.85 万亿美元——但仍低于 2007 年的峰值。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阻碍投资的复苏，税收政策的变化也可能对跨境投资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除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的 FDI 投资前景比较乐观。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预计将实现 10% 的增长。由于主要经济体投资前景的改善将可能提升投资者信心，其中相当大规模的增长将会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伴随着油价的预期适度增长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预计流入非洲的 FDI 也会实现增长。相反，由于不确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前景，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FDI 预计会趋缓。流入转型经济体的 FDI 可能会在 2016 年触底后进一步恢复。流入发达经济体的 FDI 预计会在 2017 年保持稳定。

地区投资趋势

继 2015 年强劲增长之后，2016 年全球 FDI 流量增长势头不再，这表明复苏之路仍崎岖不平。与 MNEs 的感受一致，在疲软的经济增长和重大的政策风险影响下，全球 FDI 流入量下降 2%，降至 1.75 万亿美元。



发展中经济体 FDI 流量下降尤其严重，降幅达 14%，降至 6 460 亿美元。与投资组合、汇款和官方发展援助相比，FDI 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最大且最稳定的外部资金来源。所有的发展中地区 FDI 流入量都有所下降：

- 2016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FDI 流量萎缩了约 15%，降至 4 430 亿美元。这是该地区近五年内的首次下跌，并且呈现大范围下跌，除南亚以外的大部分区域都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
- 非洲的 FDI 流量下滑至 590 亿美元，较 2015 年下降 3%，主要反映在大宗商品的低价格上。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FDI 流量加速下降，降幅达 14%，降至 1 420 亿美元，主要归因于经济持续衰退、大宗商品价格疲软以及出口压力增加。
- 结构脆弱和易受冲击的经济体 FDI 流量仍然表现脆弱。流入最不发达国家的 FDI 下降了 13%，降至 380 亿美元。同时，流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FDI 下降了 6%，降至 35 亿美元。流入内陆发展中国家的 FDI 表现稳定，约 240 亿美元。



发达经济体的 FDI 流量继前几年的显著增长后，2016 年继续增长。流入量增长了 5%，至 1 万亿美元。北美 FDI 流量的温和增长弥补了欧洲 FDI 流量的下降，并且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呈现大幅增长。发达经济体 FDI 流入量占全球 FDI 流入量的比重提高至 59%。

转型经济体的 FDI 流量经历了前两年的急速下降后，于 2016 年翻倍增长，增至 680 亿美元。这反映出大型私有化交易的增加和矿业勘探投资活动的增加。

主要经济组织，如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强烈影响了全球 FDI 的流动趋势。G20 的 FDI 流入量首次超过 1 万亿美元。一些经济组织内部的 FDI 流动增长趋势越来越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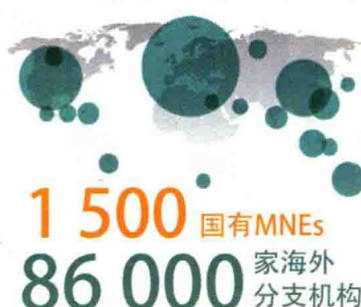
发达国家的 FDI 流出量仍表现疲软，下降 11%，至 1 万亿美元，主要归因于欧洲跨国公司投资的下滑。北美 FDI 流出量保持平稳，而来自亚太地区发达国家的 FDI 流出量达到了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来自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激增，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却下降 1%，降至 3 830 亿美元。

国际生产增速放缓导致了全球贸易扩张乏力。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国际生产仍在扩张，但近年来扩张速度放缓。海外分支机构过去五年的销售（7.3%）、附加值（4.9%）与就业（4.9%）年平均

增长率均低于 2010 年以前的同期水平（分别为 9.7%、10.7%和 7.6%）。

UNCTAD 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有 MNEs 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约 1 500 家国有 MNEs（占有 MNEs 的 1.5%）拥有了超过 86 000 家海外分支机构，占有海外分支机构的近 10%。2016 年国有 MNEs 披露的绿地投资额占全球总量的 11%，较 2010 年上升 8%。国有 MNEs 总部分布广泛，超过一半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近三分之一分布在欧盟。其中，中国是最大的母国经济体。

SO-MNEs在全球 经济中越来越重要



投资政策趋势

投资政策制定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差异化以及不确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使得投资政策更具挑战性和多面性。投资政策制定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反映了社会和政府全球化影响的不同回应。上述因素再加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使投资者对投资政策的可预见性下降。可信、具有广泛国际支持、以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为宗旨的基于规则的投资体制，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和提高投资关系的稳定性。

2016 年推出的大多数投资政策措施旨在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约 58 个国家和经济体采取了至少 124 项投资政策措施——这是 2006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许多行业放宽外国投资者的准入条件，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简化登记流程，提出新的投资激励或深化私有化措施。大约有 1/5 的措施涉及新的投资限制或监管，远远超过了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 UNCTAD 年度报告的数字。这些措施不仅体现在新立法中，也体现在行政决策中，尤其涉及外资收购的兼并控制方面。



许多国家通过专门解决国际投资协定（IIAs）类似问题的投资法来管理跨境投资。至少有 108 个国家出台了该类法律。投资法和国际投资协定在前言、定义、投资者的准入和待遇、投资促进和争端解决方面具有共同的要素。IIAs 的改革以及投资法相应条款的现代化应该齐头并进。

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不断增长，且越来越复杂。2016 年新缔结的 IIAs 有 37 项，截至年底全球 IIAs 总数已达 3 324 项（另外，2017 年已经缔结了 4 项 IIAs）。与此同时，至少 19 项 IIAs 终止，并且越来越多的 IIAs 将会终止。上述情况反映了政府在更大程度上调整其国际投资政策参与。



基于新投资协定提起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案例有增无减。2016 年，新增案例 62 起，使已知案件总数增至 767 起。截至 2016 年底，根据案情做出决定的案件有 60% 是投资者获胜。

G20 国家采用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G20 原则借鉴了 UNCTAD 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这些非约束性的原则表明，占全球对外 FDI 三分之二以上的发达、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之间首次实现投资问题的多边一致性。

国际投资协定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IIA 改革第一阶段逐渐稳固，大多数新协定也都遵循了 UNCTAD 的改革路线图（WIR2016），该路线图提出了五个行动领域：提供保护的同时维护监管权；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投资促进与便利化；确保负责任投资；加强系统一致性。改革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提上日程，具体行动正在开展（例如，新协定中的改革导向条款，该条款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投资法庭），包括多边层面上的改革。投资便利化已经成为投资者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并且 UNCTAD 的投资便利化全球行动清单已经取得了所有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有力支持。此外，新近的协定纳入了保护东道国的监管权利或促进负责任投资等条款。

当前，应迈入 IIA 改革的第二阶段：使现存的旧一代投资协定现代化。旧一代协定数量很多：当前，超过 2 500 项已生效 IIAs（占有生效协定的 95%）缔结于 2010 年以前。旧一代协定“会带来损害”：截至 2016 年底，几乎所有已公开的 ISDS 案件都是基于这些协定。另外，旧一代协定之间存在矛盾：它们的继续存在导致协定之间的重叠和碎片化问题，并提出了协定之间协调互动方面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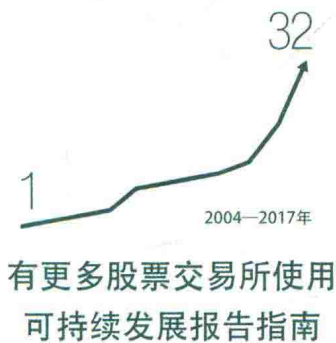
UNCTAD 提出并分析了 IIA 改革第二阶段十大政策选择的利弊：（1）共同解释协定条款；（2）修订协定条款；（3）替换“过时的”协定；（4）巩固 IIA 网络；（5）管理共存协定之间的关系；（6）参照国际标准；（7）多边参与；（8）放弃未获批的旧协定；（9）终止现存的旧协定；（10）退出多边协定。国家可以适应和采用这些选择来推动与其政策考虑相一致的改革。



确定这十大政策选择的哪一项有利于某个特定环境下的国家，需要经过仔细和基于事实的成本收益分析，同时还要应对广泛的挑战。战略挑战包括防止“过度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可能会剥夺 IIA 体制保护和促进投资的目的。造成一致性问题的空白、重叠和碎片化带来了系统性挑战。协调挑战需要确定改革行动的优先顺序，找到合适的协定伙伴以实施改革，并确保不同政策制定水平的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一致。协调系统性能力的挑战使一些小国，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更难以解决旧一代 IIAs 的不足。

加强多边支持有利于推动综合体制改革。UNCTAD 作为联合国国际投资的重要机构以及当前多层次、多领域 IIA 体制问题的高水平与包容性讨论的国际论坛，通过其三大工作支柱（研究和政策分析、技术援助、政府间共识建立）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全球范围内，以促进可持续投资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宗旨的与资本市场有关的政策及工具快速增长。这些政策和工具主要由证券交易所及其监管机构制定，但也有一些来自其他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的强势参与，比如机构投资者。与其他参与者不同，证券交易所通过新产品或服务，以及支持监管者提高市场标准等方式，影响投资者和企业。



投资及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它可以提高所有行业的竞争力、提供新的商业机遇和

创业活动，是进入海外市场及参与全球电子价值链的新途径。它也为解决不断出现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新工具。然而，还有一系列政策挑战，包括需要跨越数字鸿沟、缩小潜在的社会和发展负面影响、处理复杂的特殊网络监管问题。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机遇和挑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重要。

数字经济对投资有重要意义，而投资对数字化发展也至关重要。采用数字技术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 MNEs 的国际业务，以及对东道国海外分支机构产生影响。所有国家的数字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数字经济，都需要有针对性的投资政策。

UNCTAD
数字MNEs
100强

在过去的五年间，信息和通信技术（ICT）MNEs 在国际生产中的比重迅猛增长。2010—2015 年，UNCTAD 排名前 100 名的 MNEs 中，技术公司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这些 MNEs 的资产增长了 65%、营业收入和雇员数量增长了约 30%；相反，其他 100 强 MNEs 呈现出平稳的趋势。数字 MNEs（包括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和数字内容公司）的重要性日渐凸显。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给出了数字 MNEs 新 100 强排名，以及这些公司的国际生产足迹。

数字 MNEs 有 70% 的销售在海外，而在母国以外的资产仅有 40%。数字 MNEs 对于东道国的影响不能直接从实体投资和就业中看出，但它们的投资能够产生重要的间接与生产力方面的影响，并推动数字化发展。



在全球所有行业供应链中采用数字技术会对国际生产产生深远影响。根据特定行业和特定跨国公司的偏好，采用数字技术不仅可能导致集中的“大数据启用”生产的大型投资减少，而且还会带来灵活分布的 3D 打印生产。它可以带来回流，也可以促进服务外包。另外，它可以推动东道国供应关系的重新配置以及带来新的合作机会。

促进投资和便利化的投资规则、政策和制度，应该考虑 MNEs 不断发展的跨境运营模式。前十大传统行业受数字化影响最大，各国对其中的 5 个行业仍维持投资限制（反映在 IIA 中的保留条款中），与此同时，数字 MNEs 正扩大到其他受监管的行业。一些虚拟时代的规制可能需要重新审查，

以避免它们变得过时或无意中拖累数字化发展。

由于潜在的发展收益，大多数国家积极寻求数字机遇。2017 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涵盖了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数字发展战略的投资调查数据。

许多数字发展战略并不能处理投资问题或仅仅笼统地讨论投资需求。不足 25% 的战略包含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细节，不足 5% 的战略涉及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以外的内容，包括数字产业的发展。投资促进机构很少参与数字发展战略的制定。

投资成本估计： 不足25%的 数字发展战略 涉及此类内容

全面的数字发展战略应该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数字公司以及各行业企业数字化采用情况。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足够连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令人望而却步；UNCTAD 估计，这些国家实现基本全覆盖的 3G 网络所需要的投资成本低于 1 000 亿美元。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的区域合作可以扩大基础设施项目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促进对本地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投资对加快数字化发展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为数字公司创建和实施有利的监管框架，以及为包括技术或创新中心和孵化器在内的主体给予积极的支持措施；建立或改进电子政务服务；支持风险资本融资和其他创新的融资方式。与全球公司相联系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发展数字行业更多的是推动本土企业的发展，而非促进数字 MNEs 的投资。

促进企业对 ICTs 的投资、增进业务联系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应成为数字发展政策的重要部分。设备的关税和税收以及对互联网的使用征税，都对企业采用 ICT 的实际成本产生影响。促进访问云服务的便利化能够降低这类成本。技能的发展，如与全球数字 MNEs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本土企业与 MNEs 的数字化互动和参与电子价值链环节同样重要。

促进数字发展领域投资的同时，政策制定者还要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这需要更新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保护以及文化价值观维护等方面的监管。如果数字转换对其他行业造成破坏或对社会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政策来减轻负面影响。政府需要在公共关切与私人投资者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投资政策制定者应采取更加主动的方法来制定数字发展战略。他们不仅要准备好应对自身政策领域的关键挑战，还要为数字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出谋划策。数字化发展应根植于投资政策，而投资政策也应被纳入数字化发展战略。